

李鸿文著述选



李鸿文
著述选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李鴻章著述選

李鴻章著述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鸿文著述选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李鸿文著述选

著 者	李鸿文	封面设计	尹怀远
责任编辑	崔 凯	版式设计	胡学军
责任校对	陆 雨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市鸿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0.62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2853-5/Z·161
定 价	32.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1)
对陈独秀评价的某些问题的一些看法·····	(5)
纪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三十周年·····	(14)
试论毛泽东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 的转变（草稿）·····	(21)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战中的 几个问题·····	(42)
继承和发扬党的重视经济建设，改善群众生活的 革命传统·····	(54)
中共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问题的探索·····	(70)
论红五军上井冈山与井冈山保卫战·····	(90)
论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96)
东北地区抗日战争史研究综述·····	(108)
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组成决定的考订·····	(138)
论中共中央“北方会议”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	(147)
论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对东北抗日斗争的 影响·····	(165)
评 1935 年 6 月 3 日《王康指示信》·····	(181)
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被撤销述评·····	(210)
东北抗联各路军西征评述·····	(221)
东北抗日游击区与游击根据地述评·····	(242)
论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	(280)

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其历史意义·····	(294)
再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304)
东北地区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述评·····	(317)
记赴瑞金参加第一、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 东北代表团·····	(331)
三十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革命 活动述评·····	(342)
论全国抗战爆发前, 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 抗日战争·····	(388)
论卢沟桥事变后, 共产国际、苏联和东北抗日 斗争·····	(408)
缅怀杨靖宇将军, 学习杨靖宇将军·····	(424)
“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	(427)
记东北抗日战争中的周保中·····	(432)
记东北抗日斗争中的杨松·····	(450)
记东北抗日战争中的赵尚志·····	(465)
记东北抗日战争中的李兆麟·····	(479)
记东北抗日战争中的冯仲云·····	(496)
周保中日记片断(1935年9月9日至1936年 2月19日)(译文)·····	(511)
张中孚日记片断(1938年12月1日至1939年 5月21日)(译文)·····	(538)
马克正日记片断(1940年11月20日至1941年 5月26日)(译文)·····	(588)
附: 历年著述目录·····	(648)
后记·····	(656)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读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有许多人轻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所开展的游击战争，认为“游击战争只能声东击西，骚扰敌人，起不了多大作用，把希望寄托于号称几百万的国民党军队的所谓“正规战”。毛泽东批驳了这种观点，于1938年5月写了这篇文章，指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

游击战争在战争中按照通常的情况，本来是战术问题，其作用仅是配合正规军作战。但是，党和毛泽东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考察。为什么呢？这完全是由于中日战争的基本情况所决定的。

假如中国是个小国，战线不长，纵深没有可以回旋的余地，游击战争也就只能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近距离的直接配合作用。又如果中国能像苏联那样强大，敌人的侵入，很快就能被赶走，游击战争对于正规军战斗，也只能起一种牵制配合作用。很显然，如果中国是上述两种情况，抗日游击战争，当然就不可能是战略问题，而只能是战术问题，对于战争的全局就不可能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可是，问题就在于中日战争并不是上述的情况，中日战争的基本情况是：这个战争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大而

弱的中国，被一个小而强的日本所进攻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中日战争的基本情况当中，包括着两个因素：一是力量对比——敌强我弱，敌小我大；一是两国所处的时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正如旭日方升，而帝国主义日本则已摇摇欲坠。因此也就产生了下面两种情况，同时也就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了战略地位。

首先，由于敌强我弱，我们在战争初期必然会被敌人占领一些地方，甚至是很广大的区域，但是又由于敌小我大，敌人的兵力不够使用，在敌人占领区也就必然会留下许多空虚的地方（即所谓“空白点”）。同时，在中国已经有了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和久经锻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广大的群众积极要求抗日。上面这种情况，就使我们的游击战争可能在外线（即敌后）发展，单独作战（当然也是相对的），而且还可能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这种在敌后广泛开展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于抗日战争是有其极重要的意义的。抗战开始，国民党军队大败退，我们自己的军队又太少，敌后群众又没有组织起来，我们不但把正规性的八路军新四军等分散执行游击任务，同时也必须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由于游击队作战，能迅速地集中兵力，突然地袭击敌人，很快地结束战斗，那么只要有了党的正确领导，利用敌人的弱点（兵力不足，侵略战争，指挥错误等），就可以不断地袭击敌人，把敌人的后方也变成它的前线，使敌人腹背受敌，疲于奔命。在这不断地进攻和胜利中，积小胜为大胜，削弱了敌人，壮大了自己，逐渐地就会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变为我强敌弱，由被动转为主动，这样也就能够坚持长期抗战，达到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这也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独当一面”的作用。

其次，由于敌强我弱，敌小我大，中日战争不能在短时期内结束，就必然是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为了坚持长期而残酷的战争，发展自己，消灭敌人，首先就必须建立根据地，因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的基地。而且根据地还要不断地扩大，因为只有不断地扩大根据地才能缩小敌人的占领区，才能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长期战争。毛泽东指出建立抗日根据地必须有三个基本条件：有抗日的人民武装部队，并战胜了敌人，发动了群众，而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游击部队、游击兵团——正规性的八路军新四军等分散执行的游击战争，它可以“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是可以担负起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的。而且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群众性游击队，只要它能不断的扩大，提高为游击部队，游击兵团，当然也可以担负起建立根据地的任务。

抗日游击战争不仅能够建立根据地，同时还能够而且也是必须发展为正规军和运动战（正规战的一种形式）。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在战争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永远停留在游击队和游击战争的阶段，它必须发展和提高，它必须把自己提高为正规军和运动战，只有如此才能适应、坚持这个长期而残酷的抗日战争，才能最后在决战时解决战争的命运。抗日战争既然是长期的、残酷和复杂的，它就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步地提高成为正规部队，它的作战方式也可以逐步地正规化，由游击战发展成为正规战。

在长期的战争中，根据地不断扩大，游击部队、游击战争也逐步向前发展为正规军和正规战，在抗战中也就必然上升为抗战的主力，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在和敌人决战时，它已经发展为正规军、正规战又将是决定胜负的因素，因而也就可能使抗战胜利的结局成为人民的胜利！

由此可见，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的。抗日游击战争能在外线进行大规模的单独作战，它可以使我们能够坚持持久战，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抗日游击战争可以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并发展成为正规军和运动战，最后使抗战胜利变成人民的胜利。因此，抗日战争的敌后游击战争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和无足轻重的。党和毛泽东是把它提高到战略地位，是把它作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出发点。经过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一个战略时期，再达到抗日的正规战争的另一战略时期，抗战的胜利就必然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国民党的。总之“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①

按着党和毛泽东所指出的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在抗日时期内，在1937年抗战开始时只有4万多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止，就已发展成为100余万人的大军，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使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时期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大内战时，由从抗日游击战争中成长壮大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所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军队的进攻，并在很短的期间内完全打败了它的进攻，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原载东北师范大学《争鸣》1956年第2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对陈独秀评价的某些问题 的一些看法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当中，曾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时，他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以后在党内和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中，又成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取消派，直至被党开除最后完全堕落为一个托洛茨基派分子。陈独秀的这段历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但是，近几年来看到某些关于评价陈独秀的文章，在某些问题上我认为还是值得商榷的。

有人认为陈独秀在成为托派以前，一贯的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左派。持这种认识的人认为，陈独秀在1920年以前完全没有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是带着满脑子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投到党内来的，在党内又没有得到改造，在他的认识上始终没有看清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时代，没有看到中国工人农民的伟大力量，只看到了资产阶级，因而他一直主张二次革命，并因而断送了中国革命，堕落为托派。这种看法是值得探讨的。譬如，如果事情真是像上面有些人所认为的那么简单，那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陈独秀既然一贯是个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左派，当时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即或如何之低，革命经验即

或怎样之少，但也不能少到这种程度，竟连一个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左派分子都认识不清，竟把一个资产阶级左派分子选为党的主要领导人，而且还一直主持党中央的工作达五六年之久，这是不好解释的。但是，这的确又是事实。那么这个问题究竟怎样解释呢？是否像前面那种解释就可以了呢？我认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对于这个问题的简单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要解决上述的疑问，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较为耐心地翻看一下陈独秀在他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时，对于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时代，对于国内各革命阶级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等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就可以大体得到解决。下面我们就分别的看看陈独秀对这几个问题的分析和认识：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时代。陈独秀认为：“中国民族是全世界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已经不是封建时代一个封关的单纯的民族运动，而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①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很明确地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取得“苏俄及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力的援助”，否则便不能获得成功^②。

从这两段话中可以看出，认为是由于陈独秀不了解中国革命是处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不了解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道理，就成为形成他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思想的一方面认识上的原因的这一论断，恐怕是不确切

① 陈独秀《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载于1925年4月22日《新青年》第1号（不定期刊）。

② 陈独秀：《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载于1926年7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5号。

的。从陈独秀上面的两段话中我们看到，陈独秀的错误在于他仅限于了解到中国革命已经处于一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它必须联合苏联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奋斗的一点，而没有往前再走一步，也就是没有从上述正确认识出发，去认清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条条大路通向共产主义，没有认清正是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由于它的反对帝国主义，由于它必须取得苏联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它的发展前途就只能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它的领导者就必须是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这种革命只能是新式的民主革命而不能是旧的民主革命。因此，虽然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有某些正确的了解，但仍未超出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第二，关于国内各革命阶级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陈独秀的认识如下：

关于中国无产阶级。他认为：“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主义之天然对敌者”，因而他认为，在被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国家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攻”，否则就不可能使革命得到真正的胜利。^①但是，他又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

^① 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载于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月刊第4期。

命势力。”^① 他说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的结果，既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就“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② 他甚至把中国工人阶级划分为三类：“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不感政治的要求”；“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的极少数……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③

关于农民阶级。他认为：农民居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农民“所受外货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这一种伟大的潜势力”，于是他认为在当前的中国革命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④ 不过他又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里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⑤

关于小资产阶级。他认为这是一个革命的力量，但散漫软弱。

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他认为：经济落后的中国，民族

①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载于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2期。

② 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

③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④ 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载于1923年7月1日《前锋》第1期。

⑤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段》，载于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2期。

资产阶级“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①“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②。因此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就必须：“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③但是，他同时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④他认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便需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⑤

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革命阶级之后，陈独秀于是得出如下的公式：“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⑥

上面所引用的陈独秀的话虽然感到多一些，但是对于帮助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陈独秀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还是有意义的。从这些引证中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国各革命阶级，以及对

①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载于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2期。

②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载1923年4月25日《响导》周报第22期。

③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载1923年4月25日《响导》周报第22期。

④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⑤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⑥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这些阶级在革命中的他们的分析，并没有完全抹杀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确曾经很明确地强调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决性，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对农民的作用也曾一般地承认了他们是中国革命中伟大的力量，不能漠视。但是，既或如此，他也是仅限于承认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决性，同时他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太少，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没有革命要求，力量终于不如资产阶级雄厚，因而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顶多也只能以其坚决彻底的姿态做一个中国革命当中其他革命阶级的“督战者”；领导者还只能是资产阶级。对于农民他也是限于承认中国农民是个大势力，但同时他又认为农民目前还没有革命的要求，至多也只能是个“潜势力”而已。由于这种认识，虽然他在一篇文章当中，^①也谈到过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是天然的同盟军，不过他却没有得出，正是由于农民一个伟大的力量，他就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结论，他没有得出，正是由于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所以中国工人阶级数量虽少，但有了几万万农民的力量，有了强大的工农联盟，是可以弥补这一弱点的，因而是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者的结论。然而陈独秀的确没看到这一点，因而他就必然感到工人阶级数量少很孤立。于是，陈独秀虽然在许多文章中都不断地谈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问题，并认为资产阶级如果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援助，资产阶级是没有能力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但从阶级力量对比上来看，陈独秀却仍然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力量“集中”，比工人阶级的力量“雄厚”。因

^① 指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1925年2月7日《响导》第101期。

而也就把资产阶级摆在领导者的地位，把工人阶级摆在协助的地位，把农民丢在一旁暂时不去管他。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陈独秀认为“……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①他认为由于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所争得来的和平自由与独立，主要是给了“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②他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中国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③

但是，陈独秀在许多文章中又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并不能单独的担负起来，因此他认为中国革命“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这个革命只能是他所谓的“国民革命”。^④

从上面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分析看来，他并没有

①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载于1922年8月1日《东方杂志》第19卷15号。

②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载于1922年8月1日《东方杂志》第19卷15号。

③ 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载于1926年9月25日《响导》第172页。

④ 陈独秀：《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的概观》，载于1925年9月7日《响导》第128期。